

社会资本与媒体记忆：对比视野下媒体中的甘惜分、宁树藩纪念内容分析

王创业

摘要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在降低媒介使用门槛的同时也带来了媒体记忆的多元，更为从媒体中窥探集体记忆提供了方便。以往关于媒体记忆研究更多地使用定性方法，从对被纪念者的评价视角着手反观社会现实，而较少从纪念内容间存在的差异处探究被记忆者的社会资本。本文使用词频分析、对比分析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切入，关照了甘惜分与宁树藩先生媒体记忆差异，认为个人社会资本、桥连社会资本、黏连社会资本和象征社会资本为两人间的媒体记忆差异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视角。研究认为，学者生前累积的个人社会资本的丰厚程度，其传人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规范程度，及其自身制造象征社会资本的能力都能够影响到媒体记忆。

关键词

社会资本、媒体记忆、话语、对比分析

作者简介

王创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yake1800@126.com。

Social Capital and Media Memor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dia Content in Memorial of Gan Xifen and Ning Shufan

WANG Chuangye

Abstract

The use of new media, makes the audience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media and makes the media memory more diverse. From the media memory we can find the content of collective memory. Qualitative methods, frequently used in media memory studies, usually aim to rethink societ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valuation on those who were memorialized. Few researches bring home to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ose who were memorialized by comparing

difference of memorial contents on media. This paper use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of media content in memorial of Gan Xifen and Ning Shufa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bonding social capital and symbol social capital, 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could offer an explanation on these differences.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media memory, discourse, comparative analysis

Authors

Wang Chuangye is a doctoral student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yake1800@126.com.

一、引言

重要人物的逝世总能引发人们的纪念活动,召开座谈会、撰写回忆性的文章、建造纪念物等,这其中又以使用媒体进行纪念最为常见,是为媒体记忆。新媒体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媒介使用的门槛,使得媒体中的集体记忆更为多元、丰富。

媒体不仅能对人的社会地位赋权,而且还可对逝者的生前地位、声望再定位与再确认。但在过往的学理探讨中,关于媒体报道数量的多寡、参与者的范围、纪念活动延续的时间长短等,多是从媒介自身的视角审视,如媒介功能主义、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等,其指向的都是媒介对人的影响。在媒体记忆的研究中,关于媒体如何记忆及使用何种话语方式呈现职业名人的探讨较为集中,并将媒体记忆话语呈现背后的原因归为“现实语境对过去的重构”(如李红涛,2013;白红义,2014;张志安、甘晨,2014; Carlson & Berkowitz,2012),重新回到了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上,缺乏对媒体记忆更深层次原因的探讨。Lang & Lang(1988)认为逝者的声望掌握在他人手中,声望的承续受逝者的文化资本制约。文化资本是文化商品的物质化,它在不同的阶段中可以通过社会和社会中的阶级来获得(布尔迪厄,1997:196)。虽然社会资本也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林南,2005:9),但它并非仅局限在文化之上,而是更强调社会网络、规范与信任(张玉佩,2013)。以往与媒体相关的社会资本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参与(陈憶宁,2016;曾凡斌,2016;周翔、刘欣、程晓璇,2014; Robert W. Jackman & Ross A. Miller,1998; Ronald La Due Lake & Robert Huckfeldt,1998)、媒介使用(邓宗圣,2004;赵曙光,2014;黄含韵,2015;彭芸,2004)的视角加以关注,而探讨社会资本与集体记忆、媒体记忆相关的文献较为少见。

2016年伊始,中国新闻界(学界、业界)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新闻学

术界先后有两位老先生故去。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者甘惜分逝世,享年100岁。3月6日,复旦大学教授,新闻史学家宁树藩老先生驾鹤,享年95岁。两位先生都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生前都曾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两位老先生的职业经历也大体相似。解放前,甘惜分主要在新华社任职,解放后开始从事新闻教育与研究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专家。在从事新闻教育事业的几十年间,培养了童兵、郑保卫、喻国明等新闻学界一大批学术领军人物。1949年以前,宁树藩做过中学教师,担任过报纸副刊的主编。1955年开始从事新闻史的研究与教育工作,也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他们的逝世都引发了新闻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广泛纪念。但是,研究者通过比对却发现,媒体中对宁树藩先生的纪念范围、参与的人数及纪念的深度都比对甘惜分先生的要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媒体中又是如何对二人进行记忆的?记忆的范围、时长等又受何种因素影响?研究者收集了报纸、期刊、电视、微博、微信等媒介中关于甘惜分和宁树藩两位先生的纪念内容,通过词频分析、内容分析、对比分析的方法,意在对上述问题给予一个较为清晰的解答。

二、文献回顾

名人对媒体拥有比普通民众多得多的媒体使用权。新技术的兴起表现出了强烈的平民化与去中心化色彩,看似对普通民众进行了技术赋权,但网络中依然存在着“集体盲从”现象(Weimann,1991)。文化精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牢牢控制着媒介话语。甘惜分与宁树藩身份特殊,他们都曾是新闻业者,又都以新闻研究、新闻教育闻名,其社会关系网中连接着记者、学者等处在话语权力中心的文化知识精英,因而,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中能够调用的社会资本就较一般名人更为丰富。

(一)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资本的概念可以追溯至马克思那里。马克思在研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剩余价值。资本是能够产生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通过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实现。商品由劳动者生产,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时间远远超出了商品生产所必须的时间,虽然劳动者得到了劳动报酬,但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要远高于商品的生产价值,由此产生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入再生产,就可以不断积累资本,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就“可以将资本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投资。”(林南,2005:6-8)

布尔迪厄等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观念,将其运用到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布尔迪厄,1997:202),这一网络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与会员制相关联。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的数量取决于他所处的网络关系中可有效利用的资本以及该网络中联系人所占有的经济、文化、象征资本(加强行动者的信誉或可信度的影响力)的数量。这也即意味着不同阶层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本与其关系网络可供调配的资本直接相关,某些特殊阶级可能拥有并垄断某些特定的社会资本,用以生产和巩固其优势地位。在不同的资本中,经济资本最为基础,“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不同资本之间可以转换,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可以转换为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也能够带来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布尔迪厄,1997:208)。

科尔曼(1988:98)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由它自身的功能所决定的,一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实体构成了社会资本,“包括某些方面上的社会结构,并且在这个社会结构内,无论是个体还是关联行动者都能够推动行动者的行动。”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与这些资本不一样的是,“社会资本粘附于由行动者及行动者间形成的关系结构之中。”(Coleman,1988:98)也就是说,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更强调关系网络与网络中的行动者。

波茨(1998)在对布尔迪厄、科尔曼等人的观点分析后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从社会网络和其他社会结构中获得利益的能力”。他认为价值投入(value introjection)、有限度的团结(bounded solidarity)、互惠交换(reciprocity exchanges)和强制信任(enforceable trust)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帕特南(2000:65-78)从政治学视角将社会资本分为桥连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黏连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两种类型。前者是一种弱关系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来源于不同背景的社会关系网中,很少提供情感支持,但是可以拓宽视野。而后者是一种强关系的社会资本,如家人,亲密好友等,能够提供情感依托,具有强动员能力。这一分类,阐明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松紧程度,但却忽视了个体本身具有的资源,如性别、外貌、生活的区域等。Scheufele & Shah则认为社会资本应从三个层面衡量: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人际层面社会资本和行为层面社会资本(转引自赵曙光,2014)。

总结前人论述不难发现学者们更多地将个人置于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之中,并提出衡量社会资本的不同角度,如信任、关系紧密程度、行动者的资源等。本研究

也是基于此探讨社会资本对媒体中的集体记忆的影响,因而研究者在前人基础上从个体人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四种类型:(1)个体社会资本。指附着在个体之上的资本,包括年龄、职业(职业性质、职业角色、职业跨度)、生活的地理区域、个人经历等。(2)黏连社会资本。则指围绕个人资本而存在的首属群体。如家庭、亲人以及具有亲密关系的同事、朋友和学生。(3)桥连社会资本。由松散的社会关系构成,如一般同事、熟人、学术团体中的成员等。(4)象征社会资本。指个体的人引起他人(组织、单位)注意的聚焦能力,可以由声望或声誉带来,也可以是个体对他人的影响力,本文尤指制造文化事件的能力。

(二)从集体记忆到媒介记忆

社会资本强调社会关系网络,而集体记忆也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对记忆的影响与制约(Mohtashemi & Mui,2003:525)。法国社会学者哈布瓦赫(2002:68)曾专门论述了家庭、宗教等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在他提出集体记忆之前,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精力放在了个体记忆及记忆与大脑神经的关系之上。哈布瓦赫(2002:68)以为前人在研究记忆中割断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因而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建的。”(哈布瓦赫,2002:71)简单而言,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Schuman & Scott(1989)、Schwartz(1991)、Zerubavel(1996)等人虽对集体记忆的认识有所差异,但也都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经验、利益、价值观等出发而进行斗争、商议及互动,试图影响社会对过去的记忆。”(陈韬文、李立峰,2010)不论怎样,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现时如何影响历史及历史如何影响现时的问题,是直接式的还是累积式的,是协商妥协式的还是国家控制式的。

沿着哈布瓦赫的足迹,后来者发展出了大致两条集体记忆路径,一是以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为代表的“文化记忆”,他们将集体记忆放置到“文化学”的范畴内加以思考,认为记忆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紧密相连的概念(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2012:2)。另一路径则与本文直接相关,即媒介的集体记忆——媒体记忆——“对经由媒体叙述和使用媒体以及关于媒体的集体过往的系统性探索”(陈楚洁,2015; Neiger, Meyers & Zandberg,2011)。陈楚洁(2015)又进一步将媒介的集体记忆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察媒体报道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角色、意义和功能或分析媒体如何基于集体记忆来报道现在的新闻。如施瓦茨(1986;1991)对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梅萨达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集体记忆

既可以看做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 Carlson & Berkowitz(2012)也注意到作为新闻人的克朗凯特被新闻从业人员纪念时受到了新闻业式微的现实环境影响。另一类则探讨新闻从业者如何塑造“媒体的集体记忆”。(Zelizer,1992; Neiger, Meyers & Zandberg,2011; Zelizer & Weinblatt,2014)但是值得反思的是,集体记忆与媒体记忆都强调社会性,而在诸多研究中却往往忽略了它的社会性,而是更多地将视野集中在“功能”之上。因而有学者主张媒体记忆领域要采取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视角,重点关注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黄顺铭、李红涛,2015; 陈振华,2016)。这一路径取向恰与社会资本研究取向对接。

哈布瓦赫(2002:71)认为集体记忆是群体、阶级、民族对过去的一种共同记忆。记忆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个体式的记忆,也要依赖于他人,因此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他人记忆的影子(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2012:23)。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将集体记忆放置于社会结构中重新加以审视,便不难发现,参与记忆的人数、媒体的数量以及这些记忆主体与媒介对记忆对象的纪念深刻程度都可以成为观测集体记忆的维度。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被记忆者的影响力、威望及其所能调动社会网中的各种资源的能力,而这是哈布瓦赫等人在强调记忆的社会性时未及触碰的。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媒体记忆更多地指向纪念参与者对回忆对象的记忆形式、内容与时间持续长度等的媒体呈现,及此种呈现与个体(被记忆者)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种媒体记忆?

三、研究方法

首先,建立语料库。2016年3月31日研究者分别使用微博搜索功能、搜狗微信搜索功能和百度新闻搜索功能,以“甘惜分”、“宁树藩”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中搜得含有关键词“甘惜分”的微博1198条(新浪微博自动缺省后显示405条),微信987条,新闻报道774篇¹;与宁树藩相关的微博408条(新浪微博自动缺省后显示45条),微信137条,新闻报道12篇。由于3月31日距离宁树藩先生逝世不到一个月,考虑到数据更新以及记忆长度对时间跨度的要求,因此研究者于4月30日、6月30日再次使用同样的关键词在微博、微信与百度新闻中进行检索,对比三次数据,并未发现明显变化²。就整体而言,样本具有稳定性,可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此外,两位先生都是新闻学界知名人士,在社会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在一些期刊杂志中也会出现对二者的纪念文章,基于此种原因,本文扩大了样本范围。2016年6月30日,笔者分别以“甘惜分”、“宁树藩”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中进行全文检索,共搜索到回忆甘惜分先生的文章15篇(除去发表在甘惜分先生逝世前的文章,共获得8篇有效样本),回忆宁树藩先生的文章7篇(除去生前访谈性文章,共获得2篇有效样本)。随后对检索到的所有样本甄别、筛选,剔除非纪念性的内容,共获得有效样本324个。其中对甘惜分的纪念内容276条,对宁树藩的纪念内容48条。

其次,词频分析。对搜集所得的样本进一步编码,根据样本的媒体来源不同将其分为三类:分别为微博、微信和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在对样本的作者进行归纳时可发现纪念主体主要集中在学界和业界,因此,又以此为标准对这三类文章进行细化,以便词频分析。中文词语与英文不相同,需要先分词,然后才能做词频分析。中文词语的多义性又使得词频统计成为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大难题,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本文先使用词频分析软件(ROST、图悦和NLPIR在线分析系统)将高频词析出,然后对词性做人工辨别,筛选出头衔、形容性词语及与描述人物有关的词语,共计17个。随即使用Office软件自带的查找功能在原样本中查找、比对这些高频词,并进一步辨别该词是否与记忆对象有关,剔除不相关词语的统计(如教授一词,既有对甘惜分的限定,也有是描述喻国明等人的,因此需要加以区分并从中剔除),最终获得有效词频数。

最后,文本细读。这是以往此类文章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文本细读的目的在于要观测出媒体中对两位老先生纪念的深度,这是不能借助软件完成的。细节性、逸事性内容最能体现纪念的深度,它们既可以标示出纪念者与纪念对象的关系,也是反映纪念对象社会资本的一个有效指标。

四、研究分析

研究者以6月30日检索到的内容作为分析对象。由于使用的是关键词全文检索,因而需要验证内容,人工判定是否与纪念活动有关,发现需要将非纪念性和重复性内容剔除³。经过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324条,其中微博样本93条,微信196条,传统媒体35条。在324条样本中,对甘惜分的纪念内容共276条,占总量的85.2%,对宁树藩的纪念内容共48条,占总数的14.8%。见表一:

表一：媒体纪念数量交叉表

	微博	微信	传统媒体	总计
甘惜分	85（91.4%） （30.8%）	164（83.7%） （59.4）	27（77.1%） （9.8%）	276（85.2%） （100%）
宁树藩	8（8.6%） （16.7%）	32（16.3%） （66.6%）	8（22.9%） （16.7%）	48（14.8%） （100%）
总计	（28.7%）	（60.5%）	（10.8%）	324（100%）

由上表中可知，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传统媒体中的纪念内容，在数量上以甘惜分的所占比重最多。在所有的纪念内容中又都以微信为重要的纪念媒体，占比60.5%；微博次之，占比28.7%；传统媒体只占总量的10.8%。这一结果与现实媒介使用状况基本吻合。

（一）个体社会资本与媒体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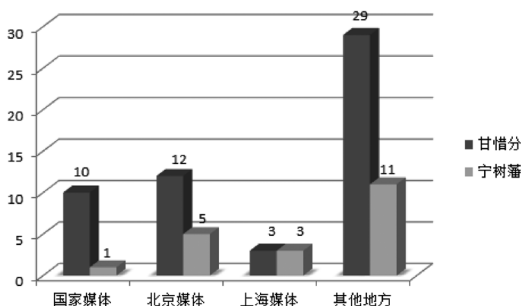
个体社会资本包括年龄、职业、生活区域。对于逝者而言，个体社会资本是指其逝世时的年龄，生前作品、生活的区域及工作经历。

研究者发现微博中最迟的一条关于甘惜分的纪念微博发表于2016年4月26日，由“林子1103”的博主发的一篇旧文，其中提到了甘惜分先生的逝世。关于宁树藩微博的最新一条是由“曹鹏闲闲堂”于3月19日发表的“去年写的回忆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的短文，现在成了纪念短文。”微博。微信中，2016年6月12日范国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半生戎马半城书——浅说甘惜分先生的书法意趣》。2016年4月18日，高冠钢发表了《忆恩师宁树藩先生》的内容。在期刊中，关于甘惜分的纪念内容最新的是2016年5月《家庭医学》刊登的《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甘惜分长寿之道》。关于宁树藩先生最新的文章则是2016年4月的《新闻记者》与《中国社会科学报》上黄旦及王天根的纪念文章。

从对甘惜分与宁树藩记忆的持续时间看，甘惜分的记忆时间跨度更长。从文章的内容看，甘惜分的寿命与书法影响了记忆的时间长度。两位老先生虽都长寿，但是甘惜分先生享年100岁，宁树藩先生享寿95岁。中国自古至今崇尚长寿，对百岁老人更是追捧有加。《礼记》有言：“百岁曰期颐”，中国文化中以100为“满”，一百岁是为一期。由此一来，《家庭医学》中提及甘惜分的长寿秘密自不在话下。对于那些声望掌握在他人手中的逝者而言，他们“活得长久，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声望。”(Lang & Lang,1988)与此不同，英年早逝亦能引发媒体记忆。早逝与中国文化中追求寿终正寝的传统观念相背离，更能够引发他人的同情与

关注,也更能够近用媒介。比较甘惜分和宁树藩因逝世时的年龄不同出现的媒体记忆差异就可窥见“活得久,能够获得更多的被记忆的资本。”此外,甘惜分的书法作品也多次在微博和微信中被展示或被提及,而观察宁树藩先生,却并未出现与此相关的纪念内容,这些依附在个体身上的资本构成了他者纪念的缘起或纪念内容的一部分,继而延长和扩大了对甘惜分的纪念时间长度与纪念参与者的范围。

地理位置也能影响两位学者身后不同媒体记忆。研究者将324个样本中的传统媒体、新媒体剥离,根据参与记忆的媒体所属地不同编码⁴,得到样本74条,其中参与纪念甘惜分的媒体有54家,参与纪念宁树藩的媒体有20家。见下图一:



图一：媒体地域对比图

在对甘惜分的报道或回忆中,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治晚报》等10家中央级媒体参与,而只有一家国家级媒体对宁树藩逝世刊发了回忆性文章。从两位逝者生前生活的区域看,北京的媒体对甘惜分的纪念报道最多,达到12家,其中网络媒体5家,电视、广播和报纸共有7家。因地理原因,上海的只有3家媒体参与了对甘惜分的纪念活动,包括了《澎湃新闻》、《东方早报》和《东方今报》。北京媒体共有5家加入了对宁树藩的纪念活动中,以网络媒体为大宗。在上海,《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澎湃》是纪念活动的主力。

上图清晰可见,参与纪念的媒体在地理区域上的数量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北京是政治中心,国家级媒体多数集中于此,这为甘惜分的媒体记忆提供了便利。上海是经济中心,其媒体数量虽然也多,但缺少能够覆盖全国的国家级媒体,媒体总量与北京相比也略逊一筹,其影响力与传播范围更多地局限于上海本地。在中国这样一种媒体结构中,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政治正确成为各级媒体的重要追求,中央级媒体的报道更容易被地方媒体关注与转载。甘惜分逝世的消息经中央级媒体

报道后,很多地方级媒体或在官微或在微信公号中直接转载。如微博中就出现《经济观察报》、《都市时报》转载央视报道内容。也有很多地方媒体根据国家级媒体或在京媒体对甘惜分逝世做综合性报道。如此便形成地方媒体紧跟省级媒体,省级媒体对中央级媒体亦步亦趋的示范效应,对逝者的媒体记忆也如涟漪一般层层扩散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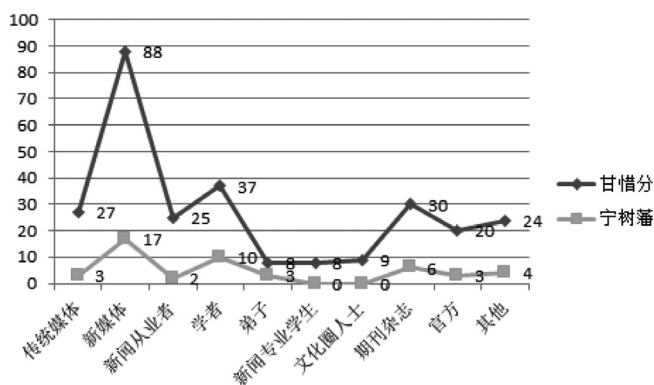
职业性质与职业经历作为个体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从对宁树藩与甘惜分的记忆比较上而言,也是诱发媒体记忆差异的一个原因。甘惜分的媒体经历较宁树藩更为丰富。他生前曾在新华社做过记者,也当过《红旗》杂志的编辑。新华社是国家级通讯社,时至今日,国家重要消息都通过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1958年创刊,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称得上是中央级别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刊物。1988年《红旗》杂志停刊,同时《求是》杂志创办,一般认为《红旗》是《求是》的前身。如此重要的两个中央机关媒体都有甘惜分职业活动身影,在纪念活动中,此种职业经历也体现了出来。新华社下属媒体发表了对甘惜分逝世的纪念内容。如新华社对外编辑部、新华视界、新华养老、新华视点等微信公号都发布了甘惜分先生的逝世或纪念性文章。甘惜分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纪念活动中非常活跃。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甘惜分治丧委员会,第一时间发布与甘惜分相关的消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则借助学院内部资源(官微、各学术团体、学术团体官微及微信公号)等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性文章。诸如人大新闻学院、人大新闻史论部、RUC新闻坊、RUC广告与传媒等,其中人大新闻史论部就发表或转载相关纪念内容11篇。再观察宁树藩生前所在单位的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宁树藩先生也从事过媒体工作,但更多的是副刊编辑。与记者相比,因编辑工作结成的社会关系网要松散一些,且他工作过的报纸也早已停刊,这都影响了参与媒体记忆的数量。复旦大学也没有像中国人民大学那样成为宁树藩纪念活动的推手,复旦大学及新闻学院除了发表了宁树藩讣告及回忆性文章外,未调动更多的校内资源,未能见到更多的纪念性内容出现。

两位逝者在高校教学、科研都有近七十年的光阴,长期以此为中心建立的社会关系网包括同事、同侪、弟子……,这些人构成了帕特南所说的桥连社会资本与黏连社会资本,并在纪念活动中挑起了回忆的大梁。两位逝者还在教育与新闻研究领域建树颇多。甘惜分是马克思新闻理论的大家,是在中国舆论研究的先行者。宁树藩在新闻史研究上成果丰硕,是将“信息”概念引入新闻定义中的第一人。生前的职业经历为他们赢得社会声誉,也影响着他们的媒体记忆。

（二）桥连、黏连社会资本与媒体记忆

个体生活在社会之中需要与他者建立联系搭建社会网络，Williams(2006)指出不同的社会网络状况可以预测出不同的社会资本，如帕特南所谓的桥连和黏连社会资本。作为弱连接的桥连社会资本是与其他不同背景的人联结而产生的一种向外的社会资本。但是作为强连接的黏连社会资本来自于相互依赖的紧密网络中，从中容易获得情感支持(Willianms,2006；陈憶宁,2016)。就本文而言，黏连社会资本是包括甘惜分、宁树藩的家人、亲友及弟子在内的社会网⁵。桥连社会资本则是除此以外搭建的社会网络，可以包括同事、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及其他相关人士。

基于此种认识，研究者将324个样本进行二次编码，共分出十种纪念主体，分别为传统媒体（指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传统媒体与非传统媒体的微博和公号，如新浪官微、刺猬公社官微等）、新闻从业者（记者、编辑、主播等）、新闻专业学生、文化圈人士（作家、明星）、学者（学术圈内的研究者及学术共同体）、弟子（与逝者有师承关系）、期刊（微博、微信中的期刊公号 and 纸质期刊）、官方（政府、学校或学院）和其他（不能够直接辨识出身份的）。见下图：



图二：各纪念主体对比图

从整体看，两人纪念主体走势非常吻合，新媒体在纪念中势头抢眼。除此以外，两人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关系联结，表现为学者与期刊杂志在纪念活动中参与的次数形成了两个小“高峰”。具体来看，在对甘惜分的纪念中，共有37位学者，25位新闻从业者，9位文化圈人士、8位弟子和8位新闻院校学生参与其中。在对宁树藩的纪念中，共只有10位学者，3位弟子和2位新闻从业者参与，在纪念主体的参与数量上少于甘惜分。

从黏连社会资本看,甘惜分的弟子众多,多数活跃在新闻传播学界,并能独当一面。童兵师从甘惜分,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在新闻学界也算得上扛鼎学者。罗以澄、郑保卫、喻国明、刘燕南等人都是学界翘楚,或在学术界身居要职,或在学术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些学者又都是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坚力量,他们能够形成合力,对甘惜分先生的记忆产生深刻影响。甘惜分的不少弟子及徒孙辈学者也在此次纪念活动中起到了助推作用。2016年1月9日02:03分,喻国明在微博中发布了甘惜分逝世的消息,此条微博共获得566次转发和233条评论。多数媒体在转发时都会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发微博称甘惜分逝世”这一消息源,在接连的几天中,媒体还多次采访了喻国明。喻国明的微博粉丝有300多万,是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他的言行能够形成行动资本,引起媒体关注。作为消息的首发者,喻国明的微博形成了“首因效应”。甘惜分的徒孙辈知名学者中如展江、姜红等人也纷纷发表文字表达纪念,这些学者在学界也具相当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对甘惜分先生纪念的“晕轮”。

在此次纪念中,宁树藩弟子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少。除了陆晔、高冠钢等人有回忆性文字出现外,更多的是同仁学者对宁树藩先生的回忆。陆晔也是国内知名学者,但未能形成喻国明那样的首发效应,一人的力量也显势单力薄,不能与其他同门形成合力,其声音也容易被其他媒介事件所淹没。从以往的期刊纪念内容来看,关于宁树藩的内容多是以采访的形式出现,其本身的显著性也不如甘惜分的众多弟子发表的回忆性文章。

上图中还显示,对甘惜分与宁树藩先生纪念的参与者还跨越了行业界线,涉及到了新闻从业者、学者、学生、同乡、文化圈人士,甚至还有一些商业公司也加入了纪念活动中,这些都能够算是两位先生的桥连社会资本,但是比较起来,甘惜分的桥连社会资本比宁树藩的更为丰富多元。共有8位新闻专业学生和9位文化圈内人士参与到了对甘惜分的记忆中。微信中,甘惜分的纪念参与者有武川县委、商业公司、鹤城理论武装部、兰州市安宁区团委等。在期刊中,更有《家庭医学》、《文明》、《钟山风雨》这样的杂志。在桥连社会资本上,与宁树藩先生有关的则只有《新闻记者》刊发了黄旦的纪念性文章和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纪念文章以及微信中的一些老乡公号 and 同乡会公号上的内容。

甘惜分长期从事台前工作,而宁树藩则从事幕后工作,社会关系也因此多少受到影响。在桥连社会资本中,甘惜分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众多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发表了许多关于甘惜分的纪念内容。如人大新闻史论部的官方微信就先后发

布了11条有关甘惜分的纪念文章，这在宁树藩先生所在的复旦大学却难得一见。此外，方汉奇先生的弟子陈昌凤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她与甘惜分并无直接师徒关系。但方汉奇与甘惜分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他二人又被称为新闻学的奠基人。陈昌凤教授在对方汉奇教授的回忆性文章中多次提及甘惜分先生，这也再次佐证了甘惜分先生的桥连社会资本更为丰富一些。同为学术界名人的陈力丹也撰文纪念甘惜分，与陈昌凤一样，这都属于甘惜分的桥连社会资本。而在宁树藩的纪念内容中却较为少见这样的桥连社会资本，虽然安徽大学教授王天根也撰文对宁树藩纪念，但是从知名度与影响力来看都不如前者。

桥连与黏连社会资本围绕个体的社会关系所搭建，体现个人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的松紧程度。媒体记忆的参与者，尤其在纪念逝者中，观察参与者出现的数量与范围也是能够反观个体的桥连与黏连社会资本的。

（三）象征资本与媒体记忆

象征社会资本是人的一种聚焦能力与吸引能力，这种聚焦能力能够吸引那些并不直接相关的注视、情感等。在媒体记忆中可以具象为媒介事件或媒体记忆深度。象征社会资本与社会关注度有关，进而影响社会记忆和媒体记忆。

2015年4月26日在北京，新闻学术界重磅人物云集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甘惜分新闻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全国各主要新闻院校院长基本悉数出席。纸媒、网媒也纷纷对此次研讨会加以报道。甘惜分弟子童兵、郑保卫、喻国明、于丽华、王继兴等人在《新闻爱好者》上连续刊文回顾甘惜分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经历。许多在京媒体也报道了甘惜分新闻学术思想研讨会，让甘惜分这位即将步入百岁的老人成为媒体热点。此次活动结束后不久，甘惜分逝世，未能实现为甘惜分先生庆祝百岁寿诞的愿望。两次媒介事件间相隔不远，相互交织，形成叠加效应，更加激发了人们纪念的热度。

而对宁树藩而言，在象征社会资本方面，学术界没有召开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从年龄上而言，他虽然也是高寿，但没有像甘惜分那样引起记忆者的强烈惋惜。虽然他与甘惜分一样都在2015年5月由中国史学会发起的“首届新闻传播学国家级学会奖”上获评“终身成就奖”，但这一事件未引起媒体太多的关注，毕竟这只是学术圈内事件，受众范围相对有限。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盖棺定论”，在纪念中出现越多的评价性词语愈能反映逝者生前的影响力。评价之语还能“锚定”逝者的身份，扩大逝者身后的影响力。细节性的内容则能反映记忆者对记忆对象的记忆深刻程度，其本质是一种带有“意识

形态”的故事。关于纪念内容中词语的使用，本文采用词频分析软件对收集得来的样本进行分类，共从两个视角三个类别比对。微博、微信和传统媒体都从学界、业界两大类所做归类，以记者、编辑及媒体单位等身份发表的内容被归为业界，而以教师、学者、学生、学术团体及学校身份表达的内容被归为学界。具体内容可见下表：

表二：词频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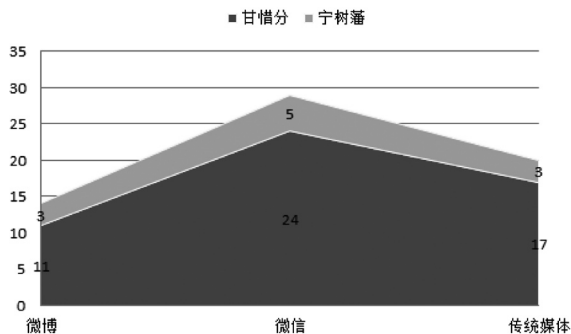
	微博				微信				传统媒体			
	甘惜分		宁树藩		甘惜分		宁树藩		甘惜分		宁树藩	
	学界	业界	学界	业界	学界	业界	学界	业界	学界	业界	学界	业界
著名	0	15	0	0	0	20	12	6	9	15	1	1
教授 (一级)	20	172	3	18	105	233	21	12	30	59	3	3
泰斗	9	34	0	0	19	39	2	0	11	34	0	0
奠基人	9	41	0	0	27	51	0	0	8	26	0	0
学者	4	32	1	0	25	56	18	22	13	32	11	10
理论家/ 史学家	2	14	0	3	12	23	21	24	6	14	2	7
探索者	4	8	0	0	1	11	0	0	5	14	0	0
导师	8	0	0	2	0	0	15	16	22	34	1	7
宗师	3	4	0	0	0	4	0	0	2	4	0	0
教育家	1	9	0	0	11	16	0	0	3	9	0	0
老人家 (甘老、 宁老)	2	0	0	0	2	0	13	6	1	1	0	0
前辈	2	0	0	3	0	0	6	4	1	2	2	2
老先生	1	1	0	3	78	9	4	59	3	22	0	1
开拓者	2	2	0	0	4	5	0	1	2	2	1	1
大师/ 大家	0	3	1	1	2	4	8	11	1	3	0	4
鼻祖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活化石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由上表可见，业界比学界更容易使用一些修饰性与限制性词语，如“泰斗”、“奠基人”、“理论家”、“教育家”等。这与业界的特性有关，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而言，使用这些词语更能够引起受众的注意，也更能彰显新闻价值，因而在对

名人逝世时所使用的词语往往重视对名人的修饰,使用名人生前的头衔等。如新华社对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发布的新闻通稿中往往会使用一连串领导人生前的职务头衔,如“优秀共产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对甘惜分与宁树藩的纪念中也不例外。因而在纪念甘惜分时就常使用“著名的马克思新闻理论家”,在纪念宁树藩时则写道“著名的新闻史学家”。对比甘惜分与宁树藩的记忆深度,可以明显发现,在对甘惜分的记忆中,使用的修饰性词语频率更多,如“探索者”、“泰斗”、“宗师”、“教育家”、“开拓者”等,而在对宁树藩的记忆中这些词语很少出现。甚至有些从未出现。从词语出现的总量来看,对甘惜分的纪念所出现的“盖棺定论”性的词语数量也远远多于对宁树藩纪念的内容。导致这一结果或与记忆本身的篇幅长短、记忆内容数量多少有关。

回忆中的细节也能够反映记忆的差异。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媒体记忆,其本质是一种叙事性故事。在以往,除非故事本身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倾向,一般而言,故事不被看做是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叙事,“但是,现在人们却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意识,一种价值系统。”(曾庆香,2005:107)因而细节作为故事描写中最闪光、最精确的部分也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细节能够让文章增色、出彩。“你如果想让人们能多看你的文章,那么你就应该选择那些触及你内心的细节。”(卡罗尔·里奇,2009:185)“当你把这个精心打造的内容放到文章中,结果就像把一枚重磅炮弹扔到了一锅汤里。”(威廉·E.布隆代尔,2006:185)要想搜集到想要的细节,必须不断自我逼问,“力求做到一切精确”(卡罗尔·里奇,2009:185)。在这个意义上看,记忆中细节出现的越多,越能够表明记忆的深度,记忆中出现的细节越多愈能说明逝者的聚焦能力。

媒体记忆中关于甘惜分与宁树藩的细节内容不尽相同,在细节展现的数量上两人之间也存在着显见的差异,见下图:



图三：细节数量对比图

在对甘惜分的记忆中,媒体叙述了大量有关甘惜分以往媒体经历以及教导学生的细节。如《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标题便是《编发刘胡兰事迹的那个人去了 众人送别新闻学泰斗甘惜分》。刘胡兰的事迹为大众熟知,但是这条消息由谁编发所知者却寥寥,《北京晚报》以此作为标题,恰巧突出了记忆的深度。再如《北京文摘》刊发的标题是《新闻泰斗“叛变”真相》也是以甘惜分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后定性为“叛变”革命这一细节作为吸引读者的引子。相对而言,纪念内容中关于宁树藩先生细节内容却少见,这样的差别与纪念内容数量有关,但也与被纪念者如何被记忆相关。

象征社会资本通过聚焦能力将记忆者吸引到记忆对象周围,在记忆中使用评价性语言与细节彰显逝者的影响力。

五、研究结论与不足

社会资本探讨的是社会网中的关系及其行动者,而媒体记忆也关注社会关系的影响。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切入解释媒体记忆在前人的研究中亦有过尝试(Puntscher,Hauser, Pichler & Tappeiner,2014:116-132)。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效在学界也已有共识。布尔迪厄(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调动社会关系的能力,是一种资源获取的能力(边燕杰,2000;安民兵,2005)。反观甘惜分与宁树藩的媒体记忆内容不难发现,这种资源不但可以加固或者改变某个人的名望或声誉,巩固或削弱其社会地位,更能够影响到记忆参与者的数量、程度、深度及延续的长度。Gladys Engel Lang & Kurt Lang(1988)在对蚀刻艺术家的声望研究中同样发现“社会学的因素影响了艺术家声望被记忆的程度”。他们认为“艺术家的生前是否已经开始获得承认;他们的艺术传人能否使其艺术对后人产生影响;把艺术品集中到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收藏网的状况如何;艺术家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符号聚焦点的能力,吸引那些与他的作品并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情感。”可以影响文化资本的累积。这也正是前文从个人社会资本、桥连社会资本、黏连社会资本和象征社会资本分析媒体记忆的原因所在。因而也可以这样认为,学者生前累积的个人社会资本的丰厚程度,他的传人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他们的社会关系及与此相关的规范程度及其自身制造象征社会资本的能力都能够影响到媒体记忆。

两位先生是中国新闻界前辈,为中国新闻事业及新闻史论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们相似的人生历程为本文提供了对比的基础,但仅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切入与解释媒体记忆的差异并不足够。

影响媒体记忆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哈布瓦赫在对福音书的研究中就已经表明, 为了使事情较为可信, 人们在记忆时会把事件设定发生在神圣之地, 或寻求当地传统的支持 (Coser, 1992; 翁秀琪, 2001)。在研究中本文也只提及空间并未顾及时间因素, 且也忽视了记忆团体对被记忆者的修饰、选择性遗漏等因素。在获得的样本中, 与宁树藩相关的样本量远少于甘惜分的样本量, 这或许与宁树藩遗嘱要求丧事从简有关, 进而也多少会影响到媒体记忆。

本文改变以往媒体记忆研究从记忆者角度切入的惯常做法, 而是从被记忆者角度入手引入了社会资本这一观察视角, 旨在抛砖引玉。在今后关于社会资本与集体记忆、媒体记忆的相关研究还有诸多可供思考与拓展的空间。如控制相关变量, 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集体记忆、媒体记忆关联性; 或为社会资本建立指标体系观测媒体记忆; 亦可从单一个案或多个案切入, 思索媒体记忆与记忆团体之关系。

(责任编辑: 方惠)

注释 [Notes]

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RUC NEWS) 在报道甘惜分教授逝世的同时对国内重要媒体与甘惜分相关的报道做了超链接, 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具体可参见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124225>。
2. 虽然百度网页中的排序出现变化, 但不影响本文研究。微博、微信出现一些新内容, 如2016年5月30日朱秋旭《“新闻”的定义》一文虽然提及宁树藩, 但是与纪念无关, 只是提到宁树藩关于新闻的认识。
3. 搜索得到的样本中有不少提及甘惜分、宁树藩的内容, 但并不与纪念活动本身有关, 故在筛选中将其剔除。在对样本的筛选中, 笔者还将两位先生的逝世时间点作为主要参考标准, 在逝世之前, 虽与回忆相关, 但只是作为参考内容。如2015年《新闻爱好者》发表的关于甘惜分先生的系列回忆性文章, 在本文中列出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性的支撑材料。
4. 有些媒体多次刊文纪念或回忆两位逝者, 如《中国青年报》、《法制晚报》对甘惜分的纪念, 《新民晚报》对宁树藩的纪念等,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地域对记忆的影响, 因而在编码中只统计一次, 不重复统计。其次同一媒体单位的报纸和网络只统计一次。
5. 根据所得样本, 纪念活动中并未出现甘惜分、宁树藩的家人刊发的纪念文章, 更多地是甘、宁两人作为导师, 其弟子发表的纪念文章较为鲜见, 因而, 黏连社会资本只能从弟子发文数量上比照。

引用文献 [Reference]

安民兵(2005). “社会资本”理论的国际比较. 《社会科学论坛》, (12), 31-33.

[An, Minbing (2005).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Forum, (12), 31-33.]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 (6), 46-60.

[Bai, Hongyi (2014). Journalistic authority, occupational id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 study on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of Jiang Yiping's retir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6), 46-60.]

边燕杰, 丘海雄(2000).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 (2), 87-99.

[Bian, Yanjie, Qiu, Haixiong (2000). Social capital of enterprises and its effec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87-99.]

陈楚洁(2015).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 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 (12), 26-45.

[Chen, Chujie (2015). The Three-fold Media Commemorative Narratives of Yang Weiguang: Boundary Work, Professional Nostalgia, and Culture Authority.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2), 26-45.]

陈韬文, 李立峰(2010).香港不能忘记六四之谜: 传媒、社会组织、民族国家和集体记忆.《新闻学研究》(台北), (103), 215-259.

[Chen, Joseph Man & Lee, Lap Fung (2010). Why Can't Hong Kong Forget the June 4th Incident? Media, Social Organization, Nation-State and Collective Memor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103), 215-259.]

陈憶宁(2016).脸书使用者的社会资本及政治参与.《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 (35), 141-183.

[Chen, Yi-Ning Katherine (2016). A Study of Facebook Users'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Hong Kong)*, (35), 141-183.]

陈振华(2016).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国际新闻界》, (4), 109-126.

[Chen, Zhenhua (2016). Collective Memory: Toward a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4), 109-126.]

邓宗圣(2004).谁在近用媒介? 初探报纸读者投书的文化资本生态.《中华传播学刊》(台北), (6), 195-239.

[Deng, Tzong-Sheng (2004). Who Gains Access to the Media? A Study of Contribution to Opinion Page in Term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6), 195-239.]

黄含韵(2015).中国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沉迷现状: 亲和动机、印象管理与社会资本.《新闻与传播研究》, (10), 28-49.

[Huang, Hanyun (2015). The status quo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addic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ffinity motivation,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0), 28-49.]

黄顺铭、李红涛(2015).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

- (2004-2014)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23.
- [Huang, Shunming & Li, Hongtao (2015). Collaborative remembering of on line collective memory: Case study based on Wikipedia Chinese term “Nanking Massacr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5-23.]
- 李红涛(2013).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及文化权威.《当代传播》,(5),18-21.
- [Li,Hongtao (2013).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ultural Authority.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5), 18-21.]
- 彭芸(2004).我国大学生的媒介使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对象之关联性研究.《新闻学研究》(台北),(79),91-133.
- [Peng, Bonnie (2004).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Media Use,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79), 91-133.]
- 翁秀琪(2001).集体记忆与认同构塑——以美丽岛事件为例.《新闻学研究》(台北),(68),117-149.
- [Weng, Shieu-chi (2001).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the Case of “Kao-Hs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68), 117-149.]
- 曾凡斌(2016).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35),101-139.
- [Zeng, Fanbin(2016).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dia Use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Hong Kong)*, (35), 101-139.]
- 曾庆香(2005).《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Zeng, Qingxiang (2005). *News Narratology*. Bei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 赵曙光(2014).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7),146-159.
- [Zhao, Shuguang (2014). A study on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Analysis from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7), 146-159.]
- 张玉佩(2013).穿梭虚拟世界的游戏少年:他/她们的社会资本之累积与转换.《中华传播学刊》(台北),(23),195-227.
- [Chang, Yu Pei (2013). Accumulation and exchange of social capital: Teenage gamers among their families, school, and game 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23),195-227.]
- 周翔、刘欣、程晓璇(2014).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因素探索——基于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的分析.《江淮论坛》,(3),136-143.
- [Zhou, Xiang, Liu, Xin & Cheng, Xiaoxuan (201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redi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microblogg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event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social capital. *Jianghuai Tribune*, (3), 136-143.]
-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

- [Zhang, Zhi'an & Gan, Chen (2014).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as a double storyteller of social histor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 55-77.]
-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2012).《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4年).
- [Erll, A., Feng, Yalin (2012).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reade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
- 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2012).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载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4年).
- [Assmann, A. & Assmann, J. (2012). Yesterday Once More: Media and social memory. In Astrid Erll, Feng, Yalin(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reade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
- 皮埃尔·布尔迪厄(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6年).
- [Bourdieu, P. (1997).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alchemy——Pierre Bourdieu interviews recorded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6).]
- 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52年).
- [Halbwachs, M. (2002).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 卡罗尔·里奇(2009).《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钟新译)(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3年).
- [Rich, C. (2009). *Writing And Reporting News: A Coaching Method(3rd Ed.)(Trans.)*.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3).]
- 林南(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1年).
- [Lin, Nan (2005).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 威廉·E.布隆代尔(2006).《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8年).
- [Blundell, William E. (2006). *The Art And Craft Of Feature Writing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8).]
- Carlson, M. & Berkowitz, D. (2011). Twilight of the television idols: Collective memory, network news and the death of Walter Cronkite. *Memory Studies*, 5(4), 410-424.
- Coleman, J.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 95-120.
- Coser, Lewis A. (199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ckman, Robert W. & Miller, Ross A.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47-73.

La Due Lake, R. & Huckfeldt, R. (1998).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Capital*, 19(3), 567-584.

Lang, G. E. & Lang, K. (1988). Recognition and renown: The survival of artistic repu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7), 79-109.

Mohtashemi, M. & Lik, M. (2003). 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 by social information: the role of trust and reputation in evolution of altruism.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23(4), 523-531.

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2011).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1), 1-24.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untscher, S., Hauser, C., Pichler, K. & Tappeiner, G. (2014).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ctive memory: A complex relationship. *Kyklos*, 67(2), 116-132.

Schuman, S. (1989).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 359-381.

Schwartz (1991). Iconography and collective memory: Lincoln's image in the American mi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2(3), 301-319.

Weimann, G. (1991). The influential: Back to the concept of opinion leader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2), 267-279.

Williams, D. (2006). On and off the net: 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1(2), 593-628.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elizer, B. & Tenenboim Weinblatt, K. (eds.) (2014). *Journalism and Mem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Zerubavel, E. (1996). Social memories: Steps to a sociology of the past.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3), 283-299.